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向好

权威部门回应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24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为A1。按这家机构的说法,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政府债务将持续走高、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

财政部等部门回应,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穆迪对我国政府债务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定还缺乏必要了解。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穆迪一方面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中国2020年政府债务升至45%？ 财政部：不成立！

穆迪的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政府直接债务将达到GDP的40%,2020年升至45%。

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国债余额12.01万亿元,两项合计后我国政府债务为27.33万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74.41万亿元计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今后,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

推进,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将保持合理增长。”该负责人说,“加上我国GDP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也将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供根本支撑,2018年至2020年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唯一合法形式,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因此,目前我国政府债务范围依法是指中央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以及清理甄别认定截至2014年末的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除此以外,我国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直接债务。

实际上,财政部门一直致力于将政府债务风险“锁进笼子”。目前已经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监督的“闭环”制度体系,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评估和预警、风险事件应急处置、债务违约分类处置、监督体系等各个环节,打造了风险管理的“全链条”。

企业杠杆率将持续走高？ 发改委：降杠杆成效显著

穆迪的报告认为,我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另外,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积极稳妥推进企业降杠杆的努力已经取得成效。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55.6%,而同期美国为255.7%,英国为

283.1%,法国为299.9%,加拿大为301.1%,日本为372.5%。

“从绝对水平看,我国杠杆率水平并不高,仅位于主要经济体的中等水平。”这位负责人说,从变化趋势看,我国总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正趋于稳定。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杠杆率开始下降。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2%,较上季度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连续19个季度上升后的首次下降。2017年3月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企业微观层面的杠杆率也呈下降趋势。

而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我国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

“不论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其举借的债务依法均不属于政府债务,应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对国有企业承担责任。”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近期,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司法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举债融资政策边界,建立跨部门联合监测和防控机制,加强对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以及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情况的监测,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和惩戒机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表示,我国对政府如何举借债务以及融资平台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制定了清晰的制度,但穆迪采取了错误的假设,把企业债务与政府捆绑在一起,这显然是误差。

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专家：过于悲观

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是穆迪下调评级的另一个依据。这家机构认为,近年来中国GDP增速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今后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预计降至5%左右。

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好于预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财政收入方面,1至4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8%,同比加快3.2个百分点,是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财政支出增长16.3%,高于收入增幅4.5个百分点,同比加快3.9个百分点,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彬彬认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反映出该机构不太了解中国发展模式和路径。“评级下调并不会带来多大影响,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稳定向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说,穆迪的预判显然“过于悲观”,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已经显现,而穆迪并没有予以客观积极的评价。

专家认为,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记者刘红霞、郁琼源、申铨、安苒)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存在三大误判

●2018至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预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

●有分析人士认为,西方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存在缺陷,信誉早已受到质疑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杜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24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同时将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穆迪提出调降评级主要有三个理由,即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地方债及企业债将增加政府或有债务。专家认为,穆迪的观点存在对中国经济明显的误读和误判,评级结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报告中预测,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达40%,2020年达到45%。但事实上,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6.7%,与上年相比变化不大。今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有望保持合理规模,2018至2020年中国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与2016年相比预计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高级交易员李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来,中国5年期国债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基准价格在80个基点左右,而这一指标几年前曾高达150个基点,这说明国际市场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风险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调中国评级的消息后,离岸人民币微跌,总体来说市场反应平稳。

其次,穆迪认为,中国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GDP增长6.9%,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随着改革持续深化,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再次,穆迪在报告中称,除了政府直接债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债务水平持续增长会增加政府或有债务。这更是对中国法律和相关规定之必要的了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规定,穆迪的上述观点不成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仍然比较低。同时,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要健康,中国政府持有的金融资产远超负担的金融债务,中国拥有充足的“财政火力”来管理债务风险。

自去年以来,不少西方机构和媒体多次谈及中国债务风险。去年3月,穆迪就曾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中国经济后来的实际表现却是“稳中有进”。

穆迪此次在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同时,上调了中国的评级展望,似乎在显示其评级的平衡与公允。但业内人士指出,穆迪此举更多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变化,在对未来前景持同样预期的情况下,调低当前评级,展望就会上调。

有分析人士认为,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对信用咨询市场具有重大影响,但其评级方法存在缺陷,信誉早已受到质疑。

首先,西方评级机构过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较大,主观性较强,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歧视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程伟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2007年,新兴市场国家获得的评级通常比负债水平近似的发达国家低8到12个等级。随着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2015年也仅仅缩小了两个等级。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6年股东大会上,“股神”巴菲特被问及为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没有得到3A最高信用评级时说:“这种信用评级根本是错误的机制,而且是阻碍前行的机制。”

其次,评级机构过度依赖历史数据,评级行为高度顺周期,难以做出前瞻性的预警。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穆迪评级没能起到预警作用,仍一直将希腊的A1评级保持到2009年年底。要知道,A1评级是穆迪评级体系中的第五高评级,这说明穆迪评级存在滞后性,缺乏前瞻性。

当然,尽管西方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存在偏差,我们不妨本着“兼听则明”的精神,将这些机构的观点视为对防范风险的提醒,把风险管控进一步做牢做实。

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管控债务风险,包括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全面构建债务监管体制、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加斯帕尔所说:“中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债务风险问题,并已采取相应措施。”

(参与记者:康逸、俞慧峰、樊宇)



图①:下高坪村的杨玉贵(右三)一家在新建的院门前留影(5月22日摄)。杨玉贵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靠发展种养殖业和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并在政府扶持下建了新房。

图②:杨玉贵(左一)一家在以前居住的房屋前留影。

图③:下高坪村63岁的杨金旺(左)和老伴杨金秀在院子里浇花(5月22日摄)。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金顶镇下高坪村居住着44户、147名普米族群众。他们曾经收入低,贫困面广,居住条件差。近年来,在当地政府和爱心企业的帮扶下,下高坪村群众积极发展种养殖业,并外出务工,收入持续增长。村里建成了硬化道路、太阳能路灯、民族文化活动室等,很多家庭新建或翻修了住房,1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2016年实现脱贫。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影报道

“我有不少身家千万的朋友常在世界各地旅游,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千万富翁”龚志荣的选择与困惑

新华社兰州5月24日电(记者邹乐)“我有不少身家千万的朋友,经常在世界各地旅游,但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想把荒山穷沟变成青山绿水,让乡亲父老早点摆脱苦日子。”说这句话的,曾是白手起家身家千万的创业者,现任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太石镇三益村村委会主任龚志荣。

早上6点刚过,记者从炕上爬起来时,发现身旁的龚志荣已出门了。在这梁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有自己放不下的场场(临洮方言:意为事业、命运等)。

馍馍配白水,就是这个黧黑的脸上透着高原红的44岁西北汉子的早饭。年迈的老母亲端上一盘炒鸡蛋,他不吃,让记者吃。吃过早饭,发动起那辆2年跑了13万公里的越野车,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益国、益党、益民就是我心中的三益村。”龚志荣说,言语之中透着豪情。他想通过自己打造的合作社带动村民增收,将三益村打造成集现代农林业、观光旅游、休闲运动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我心里被烦(临洮方言:烦、压力大)。”闲下来的时候,龚志荣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



▲龚志荣在给一棵核桃树剪去多余的树枝(5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邹乐摄

一次夜谈中,他向记者吐露了烦恼。这个坚强的汉子,说着说着眼里竟泛起了泪花。

龚志荣14岁独自去兰州打拼,20多年下来,身家超过千万,成为远近闻名的“能人”,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的想法,从来都没在龚志荣心底消失。

2014年初,龚志荣被选举为三益村村委会主任。他带着账户上超过1200万元的存款一同赴任。时不我待!为村里打井、修蓄水池、铺设管道,绿化荒山、买树苗、雇人种树,投资养羊场、养鸡场、温室大棚,甚至自掏腰包带80多位村民到西安考察现代农业……

三年时间过去了,龚志荣不但把所有存款花完,还贷款800多万元,目前靠妻子在兰州经营的饭店和自己在镇上的三益“净菜”公司勉强支持三益村的投资。“压力太大,贷款的利息都快把我压垮了。帮助大家脱贫,并不是每户给5万元钱就行,而是要帮助他们打造村级产业,帮助他们稳定增收,这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龚志荣说。

谈到自己的妻子,龚志荣满是愧疚。“我这个岁数已经折腾不起了!我怎么就花钱买不到愉快呢?”龚志荣给记者看妻子杨林霞发给他的短信。“我们一般是一周才见一面,有时一见面还会吵几句。”龚志荣说。

杨林霞对记者说:“嘴上说不支持,实际也没有办法。”来自妻子和父母的抱怨,也让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西北汉子心怀愧疚,

他没有把钱用来给家人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

肩负压力,心怀烦恼,每当要宣泄的时候,龚志荣会爬上山头,看一看已经种好的杏树,唱几首山歌。“兄弟,你有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和善良豁达的高贵品质,你一定会实现梦想!我会一直支持你!”朋友们发来的类似短信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关怀也鼓舞着龚志荣砥砺前行。

“农业发展就是见效慢,再有几个千万你再!我相信,只要坚持就能成功,不怕困难,坚持就没有干不成的!一定要把农业搞下去!”龚志荣把这些话说给记者,也说给每一个招商引资来考察的企业老板。

龚志荣摩挲着自己保存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说:“我是党员,不能让老百姓失望,一定要帮助他们稳定脱贫,不再返贫。”

“每当看到自己栽下的树苗、种下的苜蓿吐出绿芽,我都感叹种子力量的强大。我也坚信,这些树苗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种下的苜蓿也会绿遍整个山野。”龚志荣说。